

论日语“和汉混淆体”的表记创生与汉语历史依存关系

李红/于博川

摘要：日语“和汉混淆体”表记方式的创生对汉语存在着密切的历史依存关系。日本使用汉字汉文后，先后主要经历了变体汉文、万叶假名、平片假名等发展阶段，最终固定为“和汉混淆体”的现代日语表记方式。本文梳理了汉字、汉文的传入过程，概述了汉语对日语语音、万叶假名、平片假名与国字等书写要素的影响，阐明了“和汉混淆体”表记方式的确立问题，为正确认识汉语借用对日语的创新价值提供参考。

关键词：汉语；日语；假名；表记；依存关系

问题的提出

现代日语使用的文字包括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罗马字等四种文字，汉字假名混写的“和汉混淆体”是日语表记的基本形式。除罗马字之外，其他三种文字都与汉语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不少中国汉字传入日本后被原封不动地使用至今，其中也包括日本人仿造汉字创造的少数“国字”，而作为表音文字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则分别由汉字的草体和楷体演变而来。然而，自镰仓时代（1185-1333）末期开始，陆续有日本学者主张“神代文字”的存在，如相传于1367年成书的《神代口决》中就记载“神代文字象形也。应神天皇御宇異域典經始來朝以降至、推古天皇聖德太子以漢字附和字”，由此质疑汉语对日语的原创性影响。本文拟根据日语文字形成的历史事实，从汉字汉文、变体汉文到万叶假名、平片假名乃至“和汉混淆体”的日语书写演变过程，阐明日语“和汉混淆体”表记方式的创生与汉语不可分割的历史依存关系，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汉语借用对日语的创新价值，评估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和贡献测度等问题提供参考。

一、汉字、汉文的传入

在汉字传入以前，日本并无文字。据平安时代（794-1185）成书的《古语拾遗》记载，“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后行，存而不忘。”中国正史《隋书》也记载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学术界主要通过文物考古和历史文献解读两种方法进行论证。公元1世纪左右汉字传入了日本列岛，这一推测的依据是1784年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和长崎县弥生遗迹中出土的铜钱、镜子等文物。（大岛正二，2006：4-5）汉文的正式传入则要推后几个世纪。“据《日本书纪》、《古事记》、《续日本纪》记载，公元405年乐浪郡（公元前108-公元313年，汉朝政府设立在朝鲜北部的地方管辖机构）人王仁受应神天皇的邀请，赴日教授皇子菟道稚郎子汉文，并随机献上《论语》及其释文共十卷，至此汉语传入日本。”（李红，2015：54）

围绕研究汉字汉文的传入问题，日本学者冲森卓也（2006）通过三阶段的段分方式证明了汉字“形”、“音”、“义”的借入与日语表记的渊源关系。第一阶段日本人主要对汉字的“形”进行模仿。反映这一阶段情况的史料有刻在金印、镜子、七支刀等之上的金石铭文，以及刻写或用墨书写在土器等物品上的文字。在日本人所仿制的镜子、土器上，汉字多以花纹或单字的形式呈现，代表某种咒力或权威。第二阶段日本人将日语中的固有词汇与汉语结合，使用纯汉文书写、记录。如稻荷山古坟铁剑铭（471年）（表）“辛亥年七月中記乎獲居上祖名意富比埜其兒多加利足尼其兒名弓已加利獲居其兒名多加披次獲居其兒名多沙鬼獲居其兒名半弓比”，通过这种借音的方式来书写人名和地名。第三阶段是“义”的受容，通过“训”的方式将和语词与汉字字义对应，如将日语的“さかな”对应汉字的“魚”。冈田山一号坟铁刀铭（6世纪下半叶）上的“各田部”（額田部、ヌカタベ）是现存于日本的最古老的“训”文。（冲森卓也，2006：168-169）

日本学者今野真二（2017）也将汉字汉文的受容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尝试将汉文作为表达方式；第二阶段，用汉文书写整篇文章，固有名词则以日语发音的形式用汉字表记；第三阶段，试图用汉字、汉文表记日语。（今野真二，2017：33）

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光背铭（7世纪下半叶）上的文字便能反映这一发展过程及其结果。

【原文】池辺大宮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勞賜時歲次丙午年召於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願賜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將造寺藥師像作仕奉詔然當時崩賜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宮治天下大王天皇及東宮聖王大命受賜而歲次丁卯年仕奉

【训读】池辺（いけのべ）大宮に天下治めしし天皇、大御身（おほみ）勞（いたづ）き賜ひし時は、歳丙午（へいご）に次（やど）る年なり。大王（おおきみ）天皇と太子を召して誓（ちかひ）願（ねが）ひ賜ひしく、「我が大御病太平ならむと欲（おもほ）し坐（ま）す。故（かれ）、寺を造り薬師像を作りて、仕奉らむ」と詔りたまひき。然（しか）れども、当時（そのとき）に、崩（かむあが）り賜ひ造り堪（あ）へねば、小治田（をはりだ）大宮仁天下治めしし大王天皇と、東宮（ひつぎのみこ）聖王と、大命受け賜はりて、歳丁卯（ていう）に次の年に仕奉る。

上文中的“大御”等接头词，“赐”等敬语的接尾词及“造不堪者”等语序就鲜明地体现了日本人试图通过在汉文中加入日语元素，以达到使用汉字、汉文表记日语的目的。

上述内容揭示了汉字汉文传入日本的历史事实和过程，同时也描绘出日本人对其引入、吸纳、使用的认知跨度。起初日本人未将汉字视为文字，而是把它作为图画或图案加以描摹；其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开始尝试用汉文进行书写，并逐渐加入借音、用训等日本元素，使纯汉文逐渐向变体汉文演变。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日语中的假名文字“渊源来自汉字而同所谓神代文字或其他某种文字无关。”（赵连泰，2000：80）

二、“吴音”、“汉音”与“唐宋音”的语音借入

汉字由三种要素构成，分别为“字形”、“字音”和“字义”。“古代日本人在引进汉字时，将字形原封不动地导入，对其他两个要素则是花了一番心思使其能与本国语言同化。”（大岛正二，2006：14）中国汉字的字音在传入日本后，通过一段时间的演化，逐渐在日语的语音体系中固定下来。像促音、拨音、拗音这些原本日语中并不存在的音节，也因为汉字词的大量传入，在奈良时代（710-784）以后“经过各自的过程进入到了日语的音韵体系之中，为适应这一情况（日本人）开始在各种标记方法上下功夫。”（林史典，2000：347）如“心”、“文”等韵尾为鼻音时，就将鼻音音节单独分离出来作为拨音；汉字的入声易被作为促音；“手”、“長”等音节则视为拗音。由此可见，汉字字音的借入不仅丰富了日语的语音体系，也对日语的标记方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现代日语中所使用的汉字字音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吴音”、“汉音”和“唐宋音”。最早传入日本的是“古音”，也称为推古音，据说是汉代及汉代之前的发音，在现代日语中仅有个别存在，如“乃（ノ）”、“支（キ）”、“止（ト）”等。

“吴音”于公元六、七世纪传入日本，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吴地的发音。这一时期，大量源自中国的新鲜事物和新词汇直接或间接地涌入日本，表现在日常生活、佛教用语、动植物等方面的汉语词汇很典型。如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琉璃（ルリ）”、“蜜（ミツ）”、“胡麻（ゴマ）”、“縁（エン）”、“天井（テンジョウ）”、“屏風（ビョウブ）”等，佛教类的“極楽（ゴクラク）”、“經文（キョウモン）”、“功德（クドク）”、“有無（ウム）”等，动植物中的“象（ゾウ）”、“孔雀（クジャク）”、“木瓜（モケ）”、“蓮花（レンゲ）”、“紫苑（シオン）”等。

“汉音”，于公元七世纪末至八世纪传入日本，为唐朝国都长安附近的发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音也是千差万别，隋唐时期定都于中国西北部的长安（现西安），其官话自然与吴地不同，汉字的标准发音也与吴音相异。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生赴长安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他们回国后也将长安的字音带入了日本列岛。“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这还未听惯的新发音也向他们传达着唐文化的光辉之声吧。也因此，日本从奈良时代末期到平安时代初期，开始重视新传入的发音而排斥已有的汉字音。”（林史典，2000：425）日本朝廷下敕令要求人们学习汉音，但由于吴音扎根已久，无法简单地用汉音进行取代，因此出现了吴音、汉音并用的局面。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汉音再次受到重视，然而终究无法完全将吴音排斥出去，故而出现了一个汉字词内吴音、汉音并存的现象，如“食堂（シヨクドウ）”就是汉音加上吴音，“唯一（ユイイツ）”则是吴音加上汉音的构成形式。而在现代日语中，大多数字音都是汉音，如“文章（ブンショウ）”、“期間（キカン）”、“成功（セイコウ）”、“行動（コウドウ）”等。

“唐宋音”是中国宋、元时期的字音。唐宋音和吴音、汉音不同，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断续地随着某些特定的词语传入日本的。镰仓（1185-1333）、室町（1336-1573）时代的日本商人、僧人通过与宋、元、明朝的中国人交易往来，接触到了当时的汉语发音，也因此唐宋音多集中于佛教禅宗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词汇。如与佛教、禅宗相关的“看經（カンキン）”、“普請（フシン）”、“庫裡（クリ）”，与日常生活、用品有关的“饅頭（マンヂュウ）”、“蒲団（フトン）”、

“喫茶(キッサ)”、“椅子(イス)”、“瓶(ビン)”等。

需要指出的是，吴音、汉音、唐音中的“吴”、“汉”、“唐”并非表示朝代，而是代表地名。吴即吴地，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汉即代指中国的“汉人”之地的“汉”，唐则指代唐土，因此这些汉字音在表意上和它们传入日本的时期并不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汉字字音的借入一方面促成了新音节的形成，使其逐渐在日语语音中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为书写这些日语语音，日本人开始尝试采用转借汉字的方法进行表記。

三、转借汉字的万叶假名

汉字汉文受容过程中的第一、第二阶段，日本人完全将汉语作为一种外语来学习的，到了第三阶段，日语的音和汉字的义(字义)结合在了一起，即“训”，也就是“汉字与日语意义之间的对应。”(潘钧，2013: 26)在借助“训”方式的同时，他们还尝试用日语的语序书写汉文。不过，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是通过独立的虚词和固定的词序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而日语属黏着语，有词形变化，是以词根为中心依次把其余附加成分粘合在一起来表达语法意义的。由于汉日两种语言不属于同一语系，所以“训”这种简单的对应以及小部分的语序改变并不能解决语言的对接问题。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思考，日本人终于在奈良时代(710-784)创造出了利用汉字的日语音训表达方式——“万叶假名”。

万叶假名这一名称来源于《万叶集》，《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和歌集。该和歌集中频繁使用了这类假名，因此后世便将其统称为万叶假名。

万叶假名主要分为音假名和训假名两类。

音假名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以一字一音节的方式记录日语的发音。如《万叶集》卷五第 810 首(作者大伴旅人)：

伊可尔安良武 日能等伎尔可母 许惠之良武 比等能比射乃倍 和我麻久良可武

诗中所写汉字均失去了本身的含义，只用于表音，且一字对应一音节。该诗实际的日语发音是：

いかにあらむ ひのときにかも こえしらむ ひとのひぎのうえ わがまくらかむ

六世纪前半以后，训读在日语中逐渐固定下来。训读首创于朝鲜，“训”在日语中确立之后，开始混用于音假名中，同音假名一起表音，称为训假名。就是说，原本训(与训假名对应，称之为“正训”)是将同一意义的汉字与日语相对应(称之为“正对应”)，而训假名虽有字义对应这一步骤，在使用时却是把汉字的字义完全抛弃，只取其音，只作为表音文字使用。如 7 世纪中叶从飞鸟板盖宫遗迹出土的“矢田部”木简是现存最早的训假名文物，此处的“矢田部”指仁德皇后的八田皇女，本应使用表示数字的“八(や)”，却使用了同音不同义的“矢(や)”。(潘钧，2013: 26-27)

万叶假名在奈良时代(710-784)达到了全盛期，并于平安(794-1185)初期开始衰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万叶假名的字数和字形。由于汉语中同音字较多，导致日本人在假借发音时出现一

音对应多字的现象，再加上每人书写的习惯不同，没有一个共同标准，就使得万叶假名字数极多，显得极为繁杂。如“あ”对应的万叶假名有“阿”“安”“足”“婀”“鞅”、“し”对应的万叶假名有“之”“芝”“子”“次”“志”“思”“偲”“寺”“侍”“詩”“斯”“師”“四”“式”“此”“資”“時”“矢”“尸”“司”“嗣”“旨”等。

“到了七世纪末，万叶假名从体系上失去了音假名与训假名的区别，不再关注汉字的音训，而是将其作为单纯表示特定音节的文字重新编列。”（冲森卓也，2006：332）从此以后万叶假名进一步发展成为书写简单且实用的字体，由此诞生了平假名和片假名。

四、平片假名与国字的汉字仿借

假名（かな）原来称作“かんな”，一般认为是由“かりな”转化而来，“かり”指假借，“な”则指文字。假名这一名称与“真名（日文为まな，指汉字）”相对，即是说当时的日本人将汉字作为正式文字谓之真名，而将从汉字蜕变、转化而来的表音符号称作假名。假名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宇津保物语》一书中。（小松茂美，1968：64-65）

假名分为平假名与片假名，平假名由汉字草体蜕化而来，片假名由楷体蜕化而来。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字源如下表（森岡隆，2006:4-50）所示。

あ（安）	い（以）	う（宇）	え（衣）	お（於）
か（加）	き（幾）	く（久）	け（計）	こ（己）
さ（左）	し（之）	す（寸）	せ（世）	そ（曾）
た（太）	ち（知）	つ（川）	て（天）	と（止）
な（奈）	に（仁）	ぬ（奴）	ね（祢）	の（乃）
は（波）	ひ（比）	ふ（不）	へ（部）	ほ（保）
ま（末）	み（美）	む（武）	め（女）	も（毛）
や（也）		ゆ（由）		よ（与）
ら（良）	り（利）	る（留）	れ（礼）	ろ（呂）
わ（和）	ゐ（為）		ゑ（惠）	を（遠）
ん（无）				
ア（阿）	イ（伊）	ウ（宇）	エ（江）	オ（於）
カ（加）	キ（幾）	ク（久）	ケ（介）	コ（己）
サ（散）	シ（之）	ス（須）	セ（世）	ソ（曾）
タ（多）	チ（千）	ツ（川）	テ（天）	ト（止）
ナ（奈）	ニ（二）	ヌ（奴）	ネ（祢）	ノ（乃）
ハ（八）	ヒ（比）	フ（不）	ヘ（部）	ホ（保）
マ（末）	ミ（三）	ム（牟）	メ（女）	モ（毛）
ヤ（也）		ユ（由）		ヨ（与）

ラ (良) リ (利) ル (流) レ (礼) ロ (呂)
 ワ (和) ヰ (井) エ (恵) ヲ (乎)
 ン (V)

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在万叶假名即表音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前文所述，万叶假名中会出现一个日语语音对应多个汉字的情况，且同一汉字在不同作者笔下可能对应不同的音，会使读者难以辨别，因此结束这种混乱状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陆晓光，2002：95) 除音、字尽可能对应数量不多的汉字外，简化繁杂难写的汉字笔画也是演化的趋势之一。上表显示无论是平假名还是片假名，几乎都是由汉字简化而来的，且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发音的平片假名的字源并非完全一致，这说明平假名与片假名的演化过程是相对独立的。

利用简化汉字创造出平假名、片假名的同时，也促成日本人模仿汉字，仿制出了“和制汉字”——“国字”。

国字的构成方法有会意、形声、象形、指事、合字等。会意“是日本国字的基本类型”(潘钧，2013：157)。如常见的“峠(とうげ)”就是由“山”、“上”、“下”三个汉字构成，其含义也显而易见，为“山顶”之意。再如“畑(はたけ)”，由“火”、“田”组合而成，意为“田地”。笹原宏之(2006)指出，在采用会意这一方式之前，和制汉字还经历了如变形、转用、添加或置换偏旁等阶段。推古时代(593-628)以前的金石铭文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日本独有的、在中国及朝鲜的文献中找不到的汉字字形。而在进入推古时代(593-628)后，日本人开始将中国汉字的字义进行引申、派生与转化，产生“国训”，以达到自由自在使用汉字来表記日语的目的。(笹原宏之，2006：285-286)

国训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国训就是指训，将日语对应到表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之上的读法；而在狭义上，则是指与中国汉字本身的含义不同的、仅在日本使用其意义的汉字。潘钧(2013)认为，国训与国字的界限有时候是很模糊的，狭义的国训产生原理同国字产生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都存在尽可能用汉字进行书写的主观动机。(潘钧，2013：164)

国字与国训的产生、发展，印证了日本人试图掌握汉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本国语言实际需要的历史事实。这一过程“充满了试图改良汉字的能量，是在当时或更早以前的中国或朝鲜同样发生过的如出一辙的现象”(笹原宏之，2006：296)。

五、“和汉混淆体”表記方式的确立

平安时代(794-1185)，伴随着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出现，汉字假名混写的“和汉混淆体”诞生了。筑岛裕(1981)将平安时代(794-1185)的“和汉混淆体”按产生过程分成了如下三类(筑岛裕，1981：282-283)：

第一类，平安初期(九世纪)以降出现在训点资料中的汉字片假名混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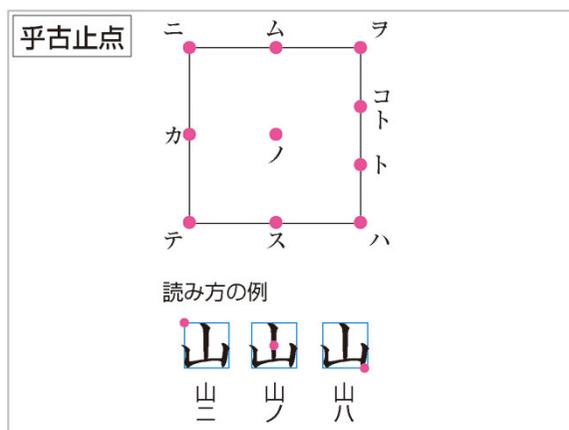
所谓训点，指训读汉文时，加在汉字之上或周围的符号(颠倒符号点、乎古止点)及假名(注音假名、送假名)等的总称。对于初见汉文的日本人来说，仅有极少数的日本人能够直接阅读作

为外语的汉文。面对大量的汉文典籍，逐字逐句译为日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了能够尽快吸收先进知识，日本人想出了标注“训点”进行快速阅读的方法。通过“训点”，日本人得以在阅读汉文原文的同时快速理解其内容。

标示“训点”的行为称为“加点”，根据加点方法和笔触颜色的不同可分为墨点、朱点、白点、角笔点（角点）等。其中，角笔点是指用角笔（由象牙、木头或竹子等材料制成）在纸面上刻下凹痕用以加点的方法，在平安（794-1192）初期已广泛用于私人文字或备忘录中。（大岛正二，2006：203-204）

“训点”大致出现在奈良时代（710-784）末期，标示在当时的佛教经典之中，书中可见表示阅读顺序的汉语数字和返点，以及表示句读的句点。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后，日本人开始在汉字周围标注万叶假名来表示日语中的助词与助动词。在做出这样的改良后不久，日本人又通过在汉字的四个角或是四边添加小点或是符号（被称为“乎古止点”）来表示助词或助动词。乎古止点的加点方式会因流派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现列举一例如下图所示：

乎古止点诞生后，日本人通常将它和万叶假名搭配使用。而在考虑到汉籍佛典的文字间距较窄这样的现实因素，用于加点的万叶假名的字形得到简化，也就慢慢蜕变为片假名。使用片假名加点既节省空间又一目了然，成为日本人训读汉籍的主要方式。如杜诗《春望》的颈联的加点如下：



烽火連^{ナリ}三月^ニ 家書抵^ル万金^ニ

诗中可见表示训读顺序的数字“一”、“二”及助词、助动词“ナリ”、“ル”、“ニ”，其训读文如下：

烽火（ほうか）三月（さんげつ）ニ連ナリ、家書（かしょ）万金（ばんきん）ニ抵（あた）ル

第二类是奈良时代（八世纪）以来的宣命书（把汉字作大字记录，把万叶假名作小字记录的独特表记方法）。宣命体是在天皇传达命令或祭神时使用的文体，特征是文字使用汉字而遵照日语语序，将音假名用两列小字的方式来表示助词及助动词。若将宣命体中的音假名换作平片假名就十分接近于现代的“和汉混淆体”。

第三类是平安中期(十世纪)以降盛行起来的“变体汉文”。即在汉文中逐渐添加平假名或片假名而形成的汉字假名混写文。

我们知道,现代日语的基本表记方式正是汉字假名混写的“和汉混淆体”。概括其历史渊源,一般认为主要有两条发展路径。其一是增加平假名文中的汉字数量(因平假名文本身就含有一定数量的汉字),从而演变为汉字平假名混写体;另一种是汉字片假名混写文中的片假名替换为平假名,最终演变成汉字平假名混写体。乾善彦(2013)通过对《太平记》、《平家物语》等著作的考察,认为汉字片假名混写文中的片假名变换为平假名这一想法更具现实性。(乾善彦,2013:160-162)

“明治(1868-1912)以降,平假名成为了活字印刷文字的一种,普通的文学书籍或杂志几乎都是汉字平假名混写文。”(矢田勉,2014:7)而采取汉字片假名混写方式的公文书也在“战后采用了汉字平假名混写文,(汉字平假名混写文)成为了唯一的普通表记体”(矢田勉,2014:7)。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和汉混淆体”成为现代日语基本表记方式的过程中,汉字至始至终都是以“原始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和汉混淆体”“至今依然为日本人民所喜闻乐见,常用不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赵连泰,2000:81)

结语

综上所述,日语表记中的平假名、片假名、日本国字以及语音的借入与构词都与汉语存在着紧密的历史依存关系。而延传至今的“和汉混淆体”表记方式,“不是人为地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更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其内在规律逐步演变而来的。”(潘钧,2013:24)它的确立反驳了“神代文字”存在的观点,明确了汉语对日语表记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为我们重新反思并深入理解汉语的创造性价值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忌部正通. 神代口訣[DB/OL]. [2018-10-29]. https://www2.dhii.jp/niji_opendata/searchlist.php?md=thumbs&bib=200005049.
- [2] 京都大学電子図書館. [曼朱院本]萬葉集 5卷[DB/OL]. [2018-10-25]. <https://m.kulib.kyoto-u.ac.jp/webopac/digview.do?bibid=RB00013506&seq=178&lang=ja>.
- [3]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古語拾遺[DB/OL]. [2018-10-25].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1610>.
- [4] デジタル大辞泉. 乎古止点[Z/OL]. [2018-06-19]. <https://kotobank.jp/word/%E4%B9%8E%E5%8F%A4%E6%AD%A2%E7%82%B9-40163>.
- [5] 今野真二. 漢字とカタカナとひらがな:日本語表記の歴史[M]. 東京:平凡社新書,2017:33.
- [6] 矢田勉. 日本語表記の構造概説[C]. TUG2013 チュートリアルを日本語で聞く会(国立国語研究所講堂)講演録,2014:7.
- [7] 乾善彦. 誰が主役か脇役か—日本語表記における漢字と仮名の機能分担[J]. 日本語学増刊 ことばの名脇役たち,2013(04):160-162.
- [8] 森岡隆. 図説 かなの成り立ち事典[M]. 東京:教育出版,2006:4-50.

- [9] 大島正二. 漢字伝来[M]. 東京:岩波書店, 2006: 4-5、14、86-88、203-204.
- [10] 平川南・沖森卓也・栄原永遠男・山中章編. 文字と古代日本 5 文字表現の獲得[M]. 東京:吉川弘文館, 2006:168-169、285-286、296, 332.
- [11] 中田祝夫、林史典. 日本の漢字[M]. 東京:中公文庫, 2000:347、425.
- [12] 築島裕. 日本語の世界 5 仮名[M]. 東京:中央公論社, 1981:282-283.
- [13] 大野晋、柴田武. 岩波講座日本語 8 文字. 岩波書店, 1977:116.
- [14] 藤堂明保. 漢語と日本語[M]. 東京:秀英出版, 1969.
- [15] 小松茂美. かな その成立と変遷[M]. 東京:岩波新書, 1968:64-65.
- [16] 矢島恭介等. 書道全集 9 日本 1 大和・奈良[M]. 東京:平凡社, 1954:142.
- [17] 李红. 近代日语词汇体系型化过程中汉语同构现象解析[J]. 或问, 2015(53):54.
- [18] 陆晓光. 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文字之起源与形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93-95.
- [19] 潘钧.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24、26-27、157、164.
- [20] 魏征, 令狐德棻撰.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1827.
- [21] 赵连泰. 试论日本文字的起源与形成[J]. 日本学刊, 2000:80-81.

基金项目: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近代科技日语新词创制与汉语借用研究”(17YJA740020); 南京农业大学社科优助项目“‘汉语型化’介译对近代日语科技词汇的建构与影响”(SKYZ2017024)。

作者简介: 李红,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日汉近代科技词汇翻译与交流、语言文化研究论、中日科技文化比较研究; 于博川,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 I. 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 II. 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 III. 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 IV. 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 V. 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 VI. 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 VII. 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1. 年3回程度の研究会
2. 年2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
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
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
5. (4)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
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术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の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

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 3-3-35 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
内田慶市研究室 (Tel. ダイヤルイン 06-6368-0431)

E-mail: u_keiichi@mac.com

URL: <http://keiuchid.sakura.ne.jp>

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